第一章　宋代儒学透视

宋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被称为新儒学。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魏晋以来儒、佛、道家互相渗透的产物宋代儒家思想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糅合道家、佛家的思想，发展成为一个有严密体系的理论形态，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因为这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对于结束五代战乱以后重建伦理纲常、维护赵宋王朝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表现出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社会功能，因而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宋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形态

一、宋代儒学概述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成就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与数百年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其学术思想形成了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的又一次高度繁荣

张岱年先生说：“宋代哲学是先秦哲学以后又一次的高峰，而且开元明清学术的先河，以后元明清学术实乃宋代学术的继续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展。清代的汉学家虽然反对宋学，其实仍是宋学一方面的发展直至近代,西学东渐,才达到另一新的阶段。"(《中国宋代哲学》序)宋代初年,由邢昺、孙奭、张景、胡瑗、孙复、石介等开创了解经述己之先路，一扫汉儒以来训诂解句之沉闷。后来，由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掀起了学术新风、他们着重以义理解经，强调笃实、务实、效实 倡导求实治国,兴起实学思潮。由于上述诸儒,或参与政事，或主教坛，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成果，在社会上影响都很大、因而，入宋以后，儒学逐渐形成为一种强劲的学术力量，而且活力日增。至北宋中期，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和程颐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邵雍的象数学、苏轼的蜀学等同时并兴,各自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学说体系。王安石颁布的《三经新义》，把古代经典作为变法的凭借，影响更为深远。张载、二程早年都曾出入于佛、道,既能人又能出,依据先秦儒家的经典,回答了佛、道所提出的问题,同时,吸取佛、道思想,创立了气学和理学,正面论述了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个重大的哲学命题。特别是理学，经南宋朱熹充实发展，成了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提高了儒学的理论水平，达到了理论思维的新的高度南宋时期，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并峙,陈亮、叶适提倡实学。宋末出现了文天祥、黄震、邓牧等卓越的思想家。于是，宋代儒学逐渐形成了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局面。

宋代儒学吸收了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思辨方法，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以“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为原则，将理与气、道与器、太极与阴阳、动与静、变与常、两与一、一与殊、体与用、心与物、性与情、诚与敬、仁与爱、理与欲、王道与霸道、革新与泥古、知与学、思与行等作为相互对应的范畴来使用，使儒学更富有思辨性、哲理性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和人的身与心的关系，是当时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

理沦概括和总结，标志着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增强了，处理人际关系、调整身心关系的能力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方克立先生说，宋代儒学“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从天人之辨到理气之辨、心物之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次大的主题转换,是中国哲学发展阶段的个重要标志,它正好是在宋代完成的” 宋代儒学经过300年的雕琢,建立了完备的思想体系,对以后700年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宋代儒学的特点

宋代儒学的特点与它研究的中心问题分不开。宋代儒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性理问题，性指本性，理指义、法则、规律理学家突出研究天理、万物之理和人生之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一)注重义理

宋儒一改汉儒注重文字训诂的汉学传统，对经书以义理去推索，被称为宋学。由汉学转到宋学，以邢昺的《论语注疏》为转折点。《四库全书提要》指出“:观其书(邢昺的《论语注疏》),大抵剪皇氏(梁人皇侃)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这个看法,恰如其分。

注重义理是宋代哲学家的共同特点、张载论述义理说“:义理,莫非天地、礼乐、鬼神、至大事’程颐在回答‘圣人之经旨如何能穷得”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以理义去推索可也。[2] 王安石创立新学也是为了立新义叶适指出：“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

1《中国宋代哲学》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天下事物而后不谬。”

注重义理之风使宋代儒学突破了汉唐以来儒学局限于天命论的障碍,以义理之说扩大了儒学研究的范围，建立了从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观、人性论到历史观的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

(二)深究性理

宋代儒学认为，义理中，性是最关键的性是事物的本性、本质，性有物之性、人之性之分，宋代儒家在研究物之性的同时，特别注重研究人之性。

程颐说：“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形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2]他还提出了性即理的原则“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3]朱熹评价说：“‘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自无古人敢如此道。‘性即理也’一语,直是自孔(丘)以后,惟伊川(程颐)说得尽这一句,便是个说性根基。”[4]

张载把人性、物性与气本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天地之性程颐把人性与理本论结合起来，主张天命之性。同时承认人有气质之性，人的个性各不相同。

清代康熙皇帝写道：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传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尽性之学，不外循理也[5]。宋儒性理思想,突破了只以善恶言性的旧观念，扩大了人性的内涵与外延。

(三)引礼入理

先秦儒学的核心思想是“礼治”，后来演变到三纲五常。到了

(1) 《叶适集·题姚令威西溪集》,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614 页

(2)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

(3)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上

(4) 朱熹:《近思录》卷一，卷一四

(5) 见《性理精义·序》。

宋代,儒学家们从重整纲常的需要出发,为三纲五常制造理论基础，进一步完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他们引礼入理，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的体现张载以唯物主义气本沦来解释三纲五常,他说：“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1]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五。”[2]朱熹说：“未有君臣之先,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之先,已先有父子之理。”[3]这样，具有官方哲学地位的程朱理学阐发天理、物理、人理，从各方面为“礼”做论证,把‘礼治’变成‘理治”,把封建礼教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礼理相通就更具有了权威性,对人们思想的引导性变成了控制性。

（四)尽性穷理

宋代儒学讲究性理，倡导尽性穷理因而重视对先秦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并在对先秦辩证法思想的阐发中，发展了先秦的辩证法思想。他们尽性穷理，探求世界、人生的未来走向。宋儒主张性即理，尽性也就是穷理，从万物一理的角度看，他们穷理涉及的问题有：

第一,变化之理

宋代儒学不仅承认《周易》中运动变化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加以发挥，明确肯定运动是世间一切事物共有的规律。欧阳修说，自然界的日、月、星、辰‘运而不已,自古以来未尝一刻息也’[4]。王安石说：“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5]苏轼说：“天以日运故行，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

[1] 张载：《正蒙·动物》
[2] 《河南程氏遗书》卷五
[3] 《朱子语类》卷九五
[4] 《欧阳文忠公文集·杂说》首
[5] 见《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无蠹"[1]他们观察了天、地、人的变化，看到了变化中的生机与活力，并探求其中之理。

第二,联系之理。

宋代儒家把自己哲学中的各个范畴看做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体系。张载说:"有太虚,有天之名,有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2]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3]他们注意分析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命、性、心、道诸范畴之间的联系。

第三,对立之理。

宋代儒家对《周易》中的对立统一思想作了发挥。如张载的"一物两体"思想对"一"与"两"的关系的论述:"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④王安石认为事物"皆各有耦","耦中有耦"⑤。二程提出:"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⑥"凡物参和交感则生,不和分散则死。"⑦他们分别对一分为二、二寓于一的两极对立思想作了十分明确的表述。

第四,一多之理。

在思维方式上，宋儒的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思想，直接涉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指出:"《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分殊而推理一。"他提出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直接涉及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朱熹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更为详尽。他们对一

⑴ 《苏东坡后集》卷○,《御试制科策》
⑵ 张载:《正蒙·太和》
⑶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⑷ 张载:《正蒙·太和》
⑸ 王安石:《洪范传》
⑹ 《周易程氏传》
⑺ 《河南程氏遗书》卷六

和多的辩证关系，理解相当深刻，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五,天地人之理

宋代儒家对待自然与人的关系，虽然没有摆脱天命论的束缚，但大多数都主张天人、心物相谐 在承认自然天的同时,看到人力的作用李觏说：“ 吉凶由人 ” 王安石说：“ 盖天道远，先天虽有官古，而所信者人事而已 ”[2]

述这些特点说明，宋代儒学已经有完备的理论体系，达到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由传统的政治伦理学,上升到哲理性的智慧之学。

三、宋代儒学对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影响

（一）实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主题的一次大转换

中国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和中心议题，哲学研究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创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中国哲学从一定意义 上说,就是天人之学,也就是从讨论天人关系开始的。在宋代，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鼓励宋儒改造旧儒学，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理学、气学、心学、实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理学家提出了把‘ 天理 ’作为世界本原的思想,以‘ 理 ’统摄天人,将‘ 理 ”贯穿于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回答使哲学中心问题由天人之辨过渡到理气和心物之辨，使自然观、伦理学融为一体，实现了由天命论到性理学的转变从天人之辨到理气、心物之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次大的主题转换，是中国哲学发展阶段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它

1 《李觏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 66页

2 《宋史 · 王安石传》

决定了宋以后哲学探讨的时代主题

（二）增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性

宋代哲学是中国古代思维发展的个新阶段无论是理沦内容之丰富，思想体系之完整，还是所提出的理沦问题之深刻，特别是思想概念之明晰，范畴抽象程度之高，哲学思辨之精密，它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均非前代可比宋代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成熟形态，其哲理思辨方法的精密化，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三)奠定了宋以后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

宋代儒学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几大流派,这一格局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代形成的哲学流派主要有：一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二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三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四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实学。这些流派直接影响了元、明、清及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第二节　宋代儒学形成的社会环境

一、经济变动的反映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宋代，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租佃制度成为主要的普遍的经济形态。以前依据门阀和等级占有土地的制度，逐步转变为主要通过自由买卖而谋得土地。宋代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上出现的重大变革，对宋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宋代地主阶级主要是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扩大土地占有，而与前朝贵族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制度有所不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也由前朝主要靠劳役地租形式，变为主要靠土地出租获取实物地租 宋代把前朝户籍注在主人名下的农奴身份的佃农,正式编入国家的户籍,不再是地主的私属 以上这些变革,使宋朝完成了

唐中期以来土地占有方式和剥削方式的变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然，广大佃农虽然在形式上摆脱了奴婢、部曲那种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依然遭受地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是，宋代经济上的变革，多少改变了佃农的社会地位,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农业相关的水利工程技术、生产工具的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耕作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也得到改良同时，手工业随着独立手工业者数量的增多,也有了大的发展,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都十分显著。北宋的造纸业和刻版印刷业有很大的提高,中央政府和某些地方政府都刻印了很多书籍,私人从事刻书的也很多，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传播创造了物质条件。北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超越当时西洋其他国家。在农业和手工业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上,北宋的商业也较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对外贸易比唐代的极盛时期还要繁荣。由于商品交易日益发展，北宋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与此同时，出现了行会组织。

经济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和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要求,这一社会变化,使宋儒改变了恪守古训的传统,在学术上发挥创造性,自由议论,对先秦儒学加以注解和发挥,往往加进了自己的见解,形成了再创造。

二、政治发展的需要

宋王朝是经历了唐、五代以来长期混乱之后建立起来的。五代时期，王朝更替不断,53 年间,易 5 姓 13 君,其中有 8 人被弑。这一时期,封建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争夺帝位,父子、君臣互相残杀,民不聊生。宋王朝在结束了长期战乱之后,为了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针对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军阀割据局面,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北宋建国以后,宋太祖等人开始制定新的制度收回高级将领的兵权，对宰相的权力

加以限制。北宋政府削减州郡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财权和兵权也都收归中央政府。宋代以科举取士,将前代依据门阀和等级取得禄位的制度,改为主要经由科举考试任用官员，使一些出身贫寒人家的人才得以出仕，参与朝政。宋王朝还规定州郡长官改由文人充任，宋朝广泛吸收文人参与军事和政治,使贵族门阀和军阀势力把持朝政的力量削弱,因而在地主阶级中具有比唐朝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央集权的程度也得到加强。为了维护统治,宋王朝特别重视加强思想统治，这就必然重视儒学的纲常伦理学说。

宋太祖赵匡胤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开国皇帝，深知战争的残酷,因而注重以非流血的手段去处理内外冲突。他出身低微,能体会到战乱对社会的破坏作用，所以致力于发展生产，创造和平环境。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却注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带头读圣贤书。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他自己喜欢读书，也经常向周围的文人请教。他做皇帝后，曾经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回答说:"道理最大。"太祖十分赞同依'道理'办事,是北宋初期政治突出的特点之一。政治环境的宽松,对宋代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非常突出的意义①。太宗任用大批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到了真宗时,真宗自称'获绍先业,谨守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打着继承太祖、太宗的旗号,大力提倡儒术,带头读圣贤书,支持儒学发展。

宋朝建立时,儒学的研究已经长期中断,佛、道二教仍在南方流行。宋太祖、宋太宗尊崇儒学也崇尚佛道,旨在争取士人,以稳定宋朝的统治。虽非出于学术目的，但也做了不少事情。宋太宗

① 《中华文明之光》(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5 页

时校订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由国子监刻版印行。真宗笃信道教，也倡导儒学，命国子监祭酒邢昺撰成《九经疏义》颁行。宋初诸帝抬高孔子地位，倡导儒学，对佛教、道教进行扶植，采取三教并举的政策，为儒学兼融佛道思想、创立新儒学奠定了基础。政治上的新变化，带来了政治思想上较为宽松的风气，这种风气为开展学术探讨，创立儒学学说，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三、科技进步的启迪

宋代是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李约瑟博士曾指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展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①。与宋代农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数学有很大的进步，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方面也有发展。特别是我国古代文明重要标志的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中的后三项发明，均是在宋代得以完善和广泛应用并传入西方的。宋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曾引起世界的关注。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的鼻祖"的培根曾评价宋代科学发明说："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产生了无数的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②宋代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宋学的发展，它影响了

①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② 〔英〕培根：《新工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宋代的哲学、教育、文化、社会伦理思想，为宋学的繁荣奠定了科学基础。

自然科学及其实践为宋代儒学思想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源泉，促进了唯物论思想的发展。各学派尽力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哲学的坚实基础，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愈来愈加进了自然科学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具有内在联系的传统。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着重研究宇宙事物的有机统一、自然和谐、生生不已的整体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宋代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科学家。沈括作为一个哲学家兼科学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他说："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①]他把物质的"气"看做世界的本原。同时，他通过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还形成了辩证的思维方法。沈括的十二节气构想就是建立在宋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沈括总结我国农业生产的规律后认为，我国以太阳出没一次为一日，月亮盈亏一次为一月的旧历法不科学。他认为，月亮的盈亏与农业生产无关，因此不能以月亮盈亏一次为一月，而应以两个节气为一月，二十四节气，刚好 12 个月。沈括这个历法于农业生产极为有利。宋代农学家陈敷在《农书》中总结我国农业生产的经验，对传统的"土宜"原则作了新的理解。他从施肥改良土壤入手，说明了农业是盗天地之时利的事业，只要人们努力，善于管理，种植得法，就可以获得丰收。因此，传统的"土宜"原则不是绝对的，表现出了改造自然的思想。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宋代儒学哲理化提供了条件，给宋代以后的辩证思维以重大的影响。宋代不少的理学家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且注重用自然科学知识说明自己的学说。如二程提

①《补笔谈》卷

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源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朱熹对自然科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哲学思想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也很深。他说“天只是一气流行,万物自生自长,自形自色,岂是逐一装点得如此?”[2]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宋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宋代实学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张岱年先生指出,所谓‘实学’指经世致用思想及自然科学的思想。宋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经世之学’,重视‘质测之学’,实学是宋学中的精华部分。

四、思维规律的趋向

宋朝建立后,经学和哲学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主要是怀疑古训,冲破旧传统,究解经义,刻意求新。汉学发展到唐代已经陷入了绝境。学者治经,都固守师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孔颖达编《正义》后,汉学不再有前进的可能。儒学要继续发展,必须另辟新径。另外,佛教与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在相当多的领域里夺取了儒学的思想阵地。佛学提出的有关宇宙和人生的许多命题,为古老的汉学所不曾有。儒学要战胜佛学就必须对这些命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安史之乱后,啖助及弟子赵匡、陆淳等治《春秋》学,抛开三传,抒发己见。韩愈、李翱著《论语笔解》,韩愈又著《原道》、《原性》等,李翱著《复性书》,相继提出‘道统’与‘性命’之说。唐人怀疑古训,自出新意的学风,为宋学的产生开辟了门径。

佛道的流行为儒学提出了论争的命题,也为儒学提供了值得汲取的思想资源。唐代佛教的禅宗南宗曾汲取了儒学而战胜了儒

[1] 《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21 页

[2] 《朱子语类》卷四五

学宋代的儒学则汲取佛道而战胜了佛道。以石介为代表的学者继承韩愈的传统,力辟佛老 胡瑗则吸取佛教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以讲授经学，为前所未有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是宋代儒学的思想渊源

宋仁宗时,《五经正义》或《九经正义》已不能保持学术垄断地位。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封建统治危机四伏。许多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图另觅济世之方。因而,独立思考的学者逐渐出现,形成了学风转变的气候,从而使学术思想界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学者从怀疑汉儒训诂，直到贬斥孟子，形成了疑古的学风。欧阳修开宋代疑古疑经风气之先河,进而认为易经的《十翼》非孔子所作,不足为据。《周礼》也未必出于周公。苏辙、苏轼怀疑《周礼》系秦汉儒者所增损,不可相信。司马光也著《疑孟》篇,对孟子提出疑问。刘敞、王安石、李觏、程颢、程颐等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方面，合力冲破旧传统，为陷入绝境的经学开拓了新路。儒者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直接探究经书义理,竞相提出新解,从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出发，经学逐渐从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方面求得新的发展，创立了宋代经学研究的新方法。

以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以来的传注经学，标志着从汉学到宋学转变的完成。怀疑经传的思潮，引起了学术思想界重新探索儒家经典的风气，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经方法，即自由解经的方法。也就是摆脱汉儒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讲微言大义,着重发挥义理。这种方法在当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后世的启迪作用非常之大。

疑经疑传思潮和自由解经的方法，对汉儒之学作了一定程度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义理之学正是从这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精神宋代儒学正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逐步挣脱汉唐以来简单粗糙的天命论的束缚,把探求

义理推进到哲学领域，从而建立了从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观、人性论到历史观的庞大的理论体系，而且坚持在每一个领域中都彻底弄清楚它的“当然”“所以然”，使中国的理论思维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节　理学、气学、心学、实学的形成

宋代儒家顺着儒、释、道相互吸收的趋势，以儒家“礼治”思想为核心，糅合道教的宇宙生成、万物系列化的理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弥补儒家哲学学说的粗糙的缺陷，建立了比较精致的哲学体系。由于宋儒们对世界本原以及经世致用的看法不同，产生了分歧，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宋代儒学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有：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实学。

一、理学的形成

理学是贯穿于宋代始终并最终被确立为官方哲学的重要哲学思潮。

“理”字出现很早。但是，真正把“理”说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产生万物的本原，则始于理学。宋代的理学，其思想来源大致出于三个方面：一是儒学经典；二是佛学，主要是华严宗和禅宗；三是太极和阴阳学说。

理学创立于北宋。北宋初期，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强调义理，重视“性与天道”的研究，倡导“明体达用”和“尊王”之学，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被称为理学之先驱。周敦颐继承他们的思想，同时，援佛道入儒，提出了理学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为

理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他取《道德经》和道教学说,与《易经》相糅合,著《太极图说》,又著《通书》阐发宗旨。他的学说最早触及了宇宙和社会起源等哲学问题,把儒家的经学哲学化,并对中央集权的统治和封建伦理纲常做出了哲学的论证。他所提出的"主静无欲"等观念,为以后的理学家所推崇。

程颢(1032—1085),字伯淳,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二程是同胞兄弟,祖籍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后迁居洛阳。因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被称洛学。他们提出"理"和"道"的概念,作为他们全部学说的基础,因而被称为"理学"或"道学"。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他们把体贴出来的"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回答,把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伦理观等方面统统纳入理学体系,对"理"作了充分论证,由天理和物理到人理,组成一个有机的学说体系,是理学的创始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立业于建阳考亭(今属福建省)。人称朱熹学派为闽学。朱熹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北宋诸家学说,以"理"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础。他也承认"气"的概念,但认为"理"在气之先;"气"依"理"而存在;"理"是永恒的,独立存在的,产生于万物之先。朱熹建立了一个体系庞大的、系统周严的哲学体系,成为南宋以后正统的官方哲学,从而把我国封建社会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① 《程氏外书》卷十二《谢良佐语录》

二、气学的形成

气学视“气”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是气一元论的宇宙观。

气学的创始人是张载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居陕西省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由于张载在陕西关中讲学，所以他建立的学派又称为“关学”在哲学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气一元论思想，把“气”作为世界的本原，张载学说的创立，是中国哲学史上气学的诞生

在宇宙的起源和构成问题上，张载认为，原始的太虚并非空无所有，而是由“气”构成的。由此深刻地论述了“气”这一重要的概念，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哲学命题张载抓住“太虚”和“气”的关系，第一次赋予“太虚”以一种具体物质的含义。因为“太虚”即“气”，所以“气”是构成世界的惟一的物质实体。他说：“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太虚者天之实也。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①]他并且指明：“太虚者，气之体。”“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②]比较明显地表述了世界的物质性的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载吸收了宋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发展了《周易》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了“一物两体”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运动变化中的“渐化”和“著化”两种形式，对朴素的辩证法作了阐发。他提出“见闻之知”“德性之知”；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主张实行“井田制”，立志“为万世开太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是气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北宋中期普遍要求改革的大潮中，创立了荆公新学。荆公新学坚持气一元论的思想，区分了“天

[1] 《张载集》，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326、324 页

[2] 《张载集》，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66、67、6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